

郑 谦 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77-1991

伍国友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郑 谦 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77-1991

伍国友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项目统筹:乔还田
责任编辑:于宏雷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周 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77—1991/郑谦 主编;伍国友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8
ISBN 978-7-01-009055-9

I. ①中… II. ①郑… ②伍… III. ①中国-现代史-1977~1991
IV. ①K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9182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77—1991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SHI 1977—1991

郑谦 主编 伍国友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0.25

字数:496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09055-9 定价:6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总 序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发表宣言,向全国同胞,并向世界各国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10月1日,在隆重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紧接着,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第一次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站立起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百多年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同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和内外战乱频仍、国家四分五裂的历史从此结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人民企盼已久的独立、统一的新中国,终于诞生了。

光阴荏苒,岁月如流。到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度过了整整一个甲子,迎来了六十周年华诞。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中国的成就,已被公认为是当代世界发展的奇迹。“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首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想象到中国可以获得如此的发展和增长的速度”。^①“中国的崛起会像19世纪德国的到来、20世

^①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2009年7月18日文章,《参考消息》2009年7月22日。

纪美国的显现一样不可避免。”^①“如果要排列二战后世界上最重要的影响世界格局的国际事件,那么除了冷战结束,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崛起并成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排在第二位不会有争议。”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基本上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权力格局”。^②

历史在前进,理论和实践在发展,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在深化。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回顾新中国走过的60年历程,我们在感到自豪的同时,也将得到许多历史的感悟和智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发展史,就其总体框架而言,分为两大时期,两大篇章: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今,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概略地算,就是前后两个“三十年”。在前一个三十年里,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旧时代积贫积弱的中国以崭新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在后一个三十年,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上下解放思想、积极进取、勇于创新,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上了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征程。这两段历史,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这条主线来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前后衔接,一脉相承的。

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七年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首先是贯彻实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解放中国大陆,建立各地各级人民政府,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建立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完成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造。在胜利完成繁重、艰巨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生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正如周恩来同志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①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为白宫提供的“2020年计划”。《环球时报》2007年9月18日。

^② 华盛顿智库裴敏欣:《中国改革开放改变了世界格局》,中国网 china.com.cn。2008—10—29。

上所说,“这一切都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1953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总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主要依靠我国内部积累和自力更生,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起来。“一五”计划时期,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明显改善。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

在推进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党领导人民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这七年间,我国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确立和发展;在对外关系和国际斗争中实行和倡导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也开始起步……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纷繁复杂的形势下,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使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所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1956年到1966年,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十年里,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既积累了重要经验又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这个以“探索”为主题的时期,开始于1956年4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同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比较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了把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等一系列新的思想和方针政策。八大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

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1957年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则言前人所不曾言,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和社会主义矛盾学说。在缺少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情况下,能够作出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判断,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毛泽东后来在《十年总结》中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这的确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良好开端。1957年的经济工作也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但也就是在这一年,由于缺乏经验,由于没有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及多种复杂因素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偏离了应有的方向。先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以致改变了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接下来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总路线虽然反映了全党、全国上下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主观愿望,但却忽视和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毛泽东和党中央曾经试图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又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1959年到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探索的过程出现了曲折,并不代表没有正确思想的积累。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在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的过程中,他又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和超越阶段、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等思想,一再反对平均主义等观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提出了许多至今仍有重要借鉴作用的观点。这些都是八大探索的继续和发展。

1960年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1961年到1965年,国民经济转入全面调整的轨道。这一时期,全党上下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制定和试行的

关于农业、工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在实践中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由于这些措施的实行,1962年到1965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可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甚至还有所发展。在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意识形态领域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更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十年建设所经历的曲折,突出反映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关于这十年历史的评价,应着重把握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论断:“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同时,不能忽视历史的另一个方面,即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①从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来看,十年间没有彻底纠正反而有所发展的“左”的错误的积累,逐渐压倒了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趋向,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造成了长达十年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是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当时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形势做了完全脱离实际的错误估计,认为只有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把被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林彪、江青等人利用毛泽东的“左”倾错误,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使全国陷入严重动乱之中。然而,在十年动乱中,不论党内还是党外,不论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群众中间,始终存在着对“文化大革命”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1967年2月老一辈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激烈的抗争;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① 邓小平:《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4页。

作期间,领导广大干部、群众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政策,使各方面的形势有了转机;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进行经济、政治、文教、科技领域及军队等全面的整顿。1976年10月,在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四人帮”和极左思潮的基础上,华国锋、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各级干部共同奋斗,使动乱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重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开始启动,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打下了基础。当然,这一切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化大革命”的失误也是一种“财富”,它促使人们思考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促使我们下决心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制定切合中国实际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政策。邓小平在总结历史教训时指出,“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拨乱反正的同时,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党、全国深入展开,思想解放的大潮惊涛拍岸。国内外大势呼唤执政党尽快就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在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二

正像恩格斯所说: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取得更大进步,没有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来得更快。“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曲折使党和人民吸取教训,经受锻炼,解放思想,立志改革,并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巨大进步获得补偿。

邓小平在1987年5月曾说,“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心情沉闷,甚至可以说是在忧虑之中,整个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还有两年徘徊。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做的事情,还是在一九七八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这次会议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及以前的“左”倾错误,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给予高度评价,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并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它实际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新觉醒,实现了社会主义史上的一场新的革命。在我们今天满怀自豪的心情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候,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深远意义更多了一些深刻的理解。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的四年,是“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时期”。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探索在思想、政治领域首先获得突破。通过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党有步骤地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针对新时期的新情况,邓小平突出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至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顺利完成。在此基础上,党把经济建设确定为“根本政治路线”的中心任务,并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有利还是有害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改革开放伊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东南沿海经济特区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起步时期的改革进程。农村经济很快活跃起来,短短三四年就初步解决了困扰我国多年的温饱问题。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显示了蓬勃生机和活力。

“后三十年”的第二段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算起。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第一次郑重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而进一步为中国的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根据邓小平的设想提出了“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道路、基本路线的确立是这一时期的一大“主题”。

在强调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党还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政治

建设的任务,逐步完善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自 80 年代起,中国的改革全面展开,蓬勃发展。改革由广大农村的率先突破转向城市,对外开放形成了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格局,国民经济实现了“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加速发展。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主题是对改革目标,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探索。从十二大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十三大“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改革的目标日益清晰。

1992 年,在成功地经受住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国内政治风波考验之后,邓小平南方谈话科学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多年来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解决了在计划与市场及其同社会主义关系上的困惑。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只有明确了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才能促进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及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的逐步形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改革最重大、最深刻的突破,它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更加充满活力,更主动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奠定了基石。

1997 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在十四大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同时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奋斗目标。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高速发展,在 20 世纪末,中国已经在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2002 年党的十六大不仅系统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提出了到 2020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五年后党的十七大,又针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新的阶段性特征,论述、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战略思想,全面、系统地归纳、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三

我们不能忘记,前三十年里,党和人民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切,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后三十年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毫无疑问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后三十年中,我们见证了一个思想解放、经济发展、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时代。在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中,党创造性地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当代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划、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伟大成就举世瞩目,中华民族的发展正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我们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①越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越应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辨一辨前行的方向。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这也是本书写作的动力之一。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这样两段话,一是: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二是: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①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12月18日。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到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一个约占世界总人口六分之一的国家将基本实现现代化。正如邓小平在 20 世纪末所预言:“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如今,中华民族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正满怀豪情走向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到建国一百周年时,我们的史书必将载入更多的光荣,更多的辉煌,更多的期待,更多的梦想!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见证新中国的百年华诞,但只要 we 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我们的心将永远与祖国同在……

郑 谦

2009 年 12 月

目

录

总序 / 1

第一章 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 / 1

- 第一节 徘徊前进中政治和解氛围的生成 / 1
- 第二节 理论认识和思想阻力的破解 / 9
- 第三节 “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局部酝酿 / 26
- 第四节 1978 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 / 31

第二章 平反冤假错案和调整社会关系 / 41

- 第一节 平反冤假错案的全面展开 / 41
- 第二节 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 54
- 第三节 合理调整新形势下的社会关系 / 71
- 第四节 恢复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 / 76

第三章 加强党对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 / 84

- 第一节 理论工作务虚会与四项基本原则问题的提出 / 84
- 第二节 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 / 96
- 第三节 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100

第四章 新“八字方针”的提出和国民经济的调整 / 110

- 第一节 国民经济状况的好转与新的冒进倾向 / 110
- 第二节 新“八字方针”的酝酿和提出 / 121
- 第三节 国民经济调整的艰难展开 / 130
- 第四节 调整工作的推进和初步完成 / 138

第五章 缘自基层的“实践突破” / 150

- 第一节 农村经济体制变革的兴起 / 150
- 第二节 城市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 163
- 第三节 对外开放的酝酿和启动 / 176
- 第四节 城乡个体工商户的出现 / 189

第六章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 201

- 第一节 党的组织建设的恢复和加强 / 201
- 第二节 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起步 / 208
- 第三节 民主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加强 / 216
- 第四节 审判林彪、江青集团主犯 / 232

第七章 营造改革开放良好的内外环境 / 240

- 第一节 军事战略的调整与百万大裁军 / 240
- 第二节 提出和平解决两岸关系的科学构想 / 251
- 第三节 调整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 / 260

第八章 改革的初步推进和全面改革纲领的制定 / 277

- 第一节 党的十二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 / 277
- 第二节 “农村一号文件”和农村新经营体制的确立 / 289
- 第三节 全面改革纲领的制定 / 299

第九章 改革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 307

- 第一节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 307
- 第二节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小城镇模式的出现 / 313
- 第三节 对外开放领域的扩大和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 / 320
- 第四节 教育、科技、文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全面启动 / 334

第十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确立和“三步走” 战略的提出 / 353

-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确立 / 353
- 第二节 制定“三步走”发展战略 / 366
- 第三节 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进一步明确 / 374
- 第四节 走以制度建设加强党的建设的新路子 / 380

第十一章 价格闯关和治理整顿 / 394

- 第一节 价格闯关的改革探索和价格“双轨制”的出现 / 394
- 第二节 经济体制改革深层次矛盾的凸显 / 398
- 第三节 治理整顿的全面展开 / 407
- 第四节 一系列“两手抓”方略的提出与实施 / 413

第十二章 改革进程中的考验和治理整顿的完成 / 428

- 第一节 “八九政治风波”的爆发与平息 / 428
- 第二节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 / 435
- 第三节 打破西方“制裁”的斗争 / 445
- 第四节 进一步治理整顿目标的胜利实现 / 454

结束语 / 463

第一章

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

第一节 徘徊前进中政治和解氛围的生成

在1976年至1978年这个过渡阶段,政治和解氛围的生成主要是通过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恢复高考制度、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事件得以实现的。

一、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粉碎“四人帮”后,虽然支撑“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势力从中央的最高层被打倒,但关系到“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调整,这时还没有取得决定性进展。

在毛泽东临终前受命,随后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依靠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果断决策,兵不血刃,迅速解决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的问题,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性灾难。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华国锋以他所处中央领导核心的地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为党、为国除了大害,立了大功。国家甚幸,民族甚幸。广大人民群众欢欣鼓舞,举杯同庆,自然对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寄予厚望。

粉碎“四人帮”之初,华国锋抓住揭批“四人帮”来解决问题,稳定局势,得到了党内党外的拥护。全国陆续清查“四人帮”在各地的帮派体系,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着手抓国民经济的恢复,取得明显成效。但是,华国锋作为中央主要领导人,没有满足历史的一个必然要求:既然打倒了“四人帮”,那么被“四人帮”打倒的邓小平就应该恢复工作。这本来是个不